第 5 卷

赫鲁晓夫时期

［1953年至1964年］

历史在1953年为苏联政治划了一条弧线。虽然斯大林着意提携马林科夫，但斯大林去世之后马林科夫并没有将最高权力稳稳地握在手中。斯大林的去世标志着苏联最高领导人权力更替的斗争拉开序幕。赫鲁晓夫从党的系统出发逐渐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他的政策调整和政治格调从某些方面迎合了苏联民意，于是，这位情绪极易冲动的党的高级工作者就成了事实上的最高领袖。

在执政初期，赫鲁晓夫显示了自己的政治魄力和才干。他力主清除贝利亚，实施新的农业政策，掀起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实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冲破阻力，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改组工业，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倡导“利别尔曼建议”的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论，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有一种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决策气势和工作态度。但赫鲁晓夫实际上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他的文化修养比较差，理论水平很低，这就决定了他的决策风格是情绪型的，带有明显的情绪冲动的痕迹。赫鲁晓夫鼓吹“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冒进理论，制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表；督促大规模种植玉米；将党分为工业党农业党；心血来潮地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酿成严重的国际政治危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大搞大党主义，挑起中苏论战，对中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等等。所有这些，表明赫鲁晓夫没有很好地理解转折时期苏联迫切要求变革的需要，无法完成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重任。斯大林时期传统的东西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太深，他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

纵观 50 至 60 年代中期的苏联形势，我们看出，主要有两种互相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政治力量和思想趋向在影响苏联改革进程。革新的力量和趋向，力图推动改革，为改革开辟道路；而保守力量和趋向则竭力抵制改革，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这两种力量和趋向的斗争、冲突，构成了赫鲁晓夫改革所处的新旧交替的转折年代。赫鲁晓夫改革的不彻底性、局限性和矛盾性，正是这个年代的两种力量冲突的反映。

抛去一切表面性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在决策上主要考虑了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如何增强苏联国力；第二个因素就是采用什么样方式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赫鲁晓夫看来，斯大林的那一套政治经济体制有的可以运用，有的则必须进行改革。可以这样说，赫鲁晓夫是改革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第一人。尽管赫鲁晓夫决策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但是他最主要的决策基点是锐意改革。

第29章

决策高层的变动和政策调整

（1953年至1956年）

第1节　斯大林逝世与高层权力结构重组

从政治学方面看，权力集中的决策者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他必须寻找某种方式来减少和缓解这种压力。尽管斯大林握有绝对的权力，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但他仍然面临这种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压力。斯大林的决策使苏联20多年来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苏联内部所积聚的能量越来越大，得不到正常的孔道释放。人民希望喘口气，过上正常的生活，从而摆脱持久的非常状态所带来的沉重压力。这种社会趋向对斯大林的决策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要么斯大林适应这种社会趋向，改变政策；要么斯大林感知到这种压力后继续维持原有的政策，并且加大原有政策的力度。斯大林晚年显然采取了后一种选择。二是决策核心内在无形的压力。斯大林年事已高，体力对他提出了挑战。最高权力的更替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斯大林一直处于矛盾之中：要么他将最高权力交给别人，如马林科夫，但他必须容忍政策的哪怕是微小的调整，必须忍耐失去最高权力而

产生的心理失衡；要么他继续握有权力，而使自己继续承受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应该说，斯大林的后继者无人敢于主动向他提出挑战。后继者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但那只是为争取斯大林之后的最高地位而展开的。斯大林面临的压力，一种是社会的，一种是自我的。

斯大林去世

1953年3月4日8时整，苏联塔斯社播发一则震动世界的消息，斯大林突然患病，病势严重。随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发布斯大林病情公报。公报说，3月1日晚,斯大林在莫斯科寓所患了脑溢血，大脑严重损坏，并失去知觉和说话能力。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还联合发布了告苏联人民书，呼吁人民“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要加倍团结一致和坚韧不拔，并保持警惕”。

斯大林是突然患病的。据赫鲁晓夫等人回忆，1953年2月28日（星期六）晚上，他还照例邀请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等人在孔策沃别墅举行晚宴。当时斯大林的情绪一直很好，看不出他有丝毫病态。直到第二天凌晨，斯大林才兴致勃勃地送大家离去。他甚至高声说笑，用手指打趣地戳戳赫鲁晓夫的肚皮，学着乌克兰语的腔调称赫鲁晓夫为“尼基塔”。送走客人后，斯大林开始休息。但直到第二天晚上，值班人员还没有听到斯大林按铃叫送晚饭。值班人员担心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又不敢擅自闯入斯大林的卧室。于是，他们打电话把马林科夫等人叫来。当他们进入斯大林卧室时，发现他正和衣卧在地板上，已不省人事。

医生诊断结果是，斯大林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引起脑溢血，右半身已瘫痪，失去说话能力，病情极为严重。

斯大林得病是必然的。过分的烦劳和孤独损坏了他的身体。

“医生案件”发生后，他不再找任何医生看病，就连他曾最信赖的医生维诺格拉多夫院士也被当成间谍而投入监狱。他有病时只好自己弄些偏方，乱吃些药。他甚至不听医生的告诫，在发病前的24小时，竟然洗了蒸汽浴。这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医生对斯大林进行昼夜特别护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参加24小时特别护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为一班，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为一班，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为一班。这张值班表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决定的。

3月2日,斯大林一度恢复知觉。虽然他仍然不能说话,但他的面部开始有了表情。医生用汤匙喂他汤水和甜菜。他举起左手指指墙壁。原来墙上挂着一幅从《星火》画报上剪下的画，画面是一个小女孩用兽角当杯子喂一头羊羔。随后，斯大林开始用左手同大家握手。他的右手已不能移动。

斯大林一发病，贝利亚就趾高气扬，对斯大林口吐怨言。可是，当斯大林病情有所好转时，贝利亚面孔一变，跪下来，抓住斯大林的手亲吻起来。当斯大林再次失去知觉后，他又原形毕露。斯大林弥留时，苏共党内权力斗争已紧罗密鼓地开始了。

值班时赫鲁晓夫对布尔加宁说，“医生已经讲过斯大林活不成了。你知道，斯大林死时，我们将会处于什么地位？你可知道贝利亚将为自己攫取什么职位？”

“哪一个职位？”

“他自己想当国家安全部部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当这个。如果他当了国家安全部长，那就是我们末日的开始。他是为了毁灭我们才想谋取这个职位的，而且，如果我们让他当，他肯定是要这样干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当，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让他当！”

布尔加宁表示同意。于是他们进一步商讨行动步骤。赫鲁晓夫说：“我愿意去同马林科夫谈。我想他会和我们一样看的。他也一定明白必须有所行动。假如我们不采取一些行动而且不马上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取的话，这将意味着党的一场灾难。这远不止只是涉及我们个人的问题，虽然我们也当然不愿意让贝利亚在我们背上戳上一刀的。如果贝利亚放手干了，他可以把时钟拨回 1937 年到 1938年——他还可以干出更坏的事来。”①

3 月 6 日清晨，莫斯科广播以哀乐为前奏，沉痛宣告“列宁的战友、继承列宁的天才和事业的旗手、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英明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于 1953年 3 月 5 日 21 时 50 分逝世，终年 73 岁。塔斯社播发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签署的《告全体党员、苏联全体劳动人民书》，还公布了由苏联卫生部部长阿·弗·特雷季雅科夫、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处处长伊·伊·库柏林以及另外 7 名医生共同签署的《斯大林病况和逝世情况诊断书》和《关于斯大林遗体的病理解剖检查报告》。

当天，苏联当局组成了斯大林治丧委员会，赫鲁晓夫任主席，委员有拉·莫·卡冈诺维奇、尼·米·什维尔尼克、阿·麦·华西列夫斯基、纳·麦·别哥夫、帕·阿·阿捷米耶夫、米·阿·雅斯诺夫等 7 人。

十分重要的高层会议

当天晚上，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填补因斯大林逝世而产生的权力真空。联席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我们党和国家这个困难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整个生活得到不间断的正确的领导，因此就需要我们的领导保持最紧密的团结，防止任何不协调和混乱现象，以便彻底保证我们党和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政策能够顺利实现。根据这一点，同时为了防止对于各级国家机关和党组织的活动的领导发生中断起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必须采取若干措施，调整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②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改组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二是任命重要人选。

联席会议决定，把苏联部长会议中的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改为一个机构，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它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组成，任命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任命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建议由伏罗希洛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解除什维尔尼克的这一职务；将苏联国家保安部和苏联内务部合并为一个部，即苏联内务部，任命贝利亚为苏联内务部部长；会议任命莫洛托夫为苏联外交部长，米高扬为苏联外贸部长，布尔加宁为苏联国防部长。

联席会议认为有必要根据党章的规定，将苏共中央的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改为一个机构，即苏共中央主席团。为了使领导机构更有效率，决定主席团由委员 10 人和候补委员 4 人组成。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是什维尔尼克、波诺马连科、美尔尼科夫、巴吉罗夫。增选伊格纳切夫、波斯别洛夫、夏塔林为苏共中央书记。联席会议认为，有必要让赫鲁晓夫集中精力从事苏共中央工作，因此，解除他的苏共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由苏共中央书记米哈伊洛夫继任。

主要政治权力掌握在三个人手中

这次联席会议明确显示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治权力的最初组合与分配。真正掌握权力的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他们完全左右了这次联席会议的重要人事任命。贝利亚提议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反过来，马林科夫建议贝利亚担任苏联内务部部长。这一情况在斯大林葬礼上得到印证。斯大林葬礼具

体事宜是赫鲁晓夫负责的，但在斯大林葬礼上发表讲话的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当时苏联国内外都认为，这就是苏联政治上新的三驾马车。

但这个三驾马车很不稳固。马林科夫地位得天独厚，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党内重要人物。但斯大林去世之后，马林科夫对自己的位置十分敏感，处理问题趋于谨慎，事事小心。也许是历史的惯性，也许是贝利亚搞的名堂，斯大林刚刚去世，报界对马林科夫的颂扬和宣传十分明显，马林科夫对此感到很紧张。为此，他于 3 月 10 日专门召集了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他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不要过分宣传个人，“要停止执行个人崇拜的政策”③。马林科夫是一个典型的行政管理人员，这是斯大林有意培养的结果。莫洛托夫评价说：“马林科夫是个很得力的执行者。我们称他为‘电话迷’——他总是坐在电话机旁。他知道到哪里打听些什么事，这方面他擅长。”莫洛托夫还评价说：“组织行政事务、分配干部这都是马林科夫负责的工作，还有向各地发指示，商洽等等也是他管的一切问题。他抓得很紧，搞事务忙工作，是个很积极、能干、善交际的人。在主要问题上沉默寡言……”莫洛托夫还说，马林科夫“循规蹈矩”，缺乏理论修养，“不能真正可靠地把握方向”,他‘书生气十足”,他可以把事情做得有条不紊,可是不能比较系统地评论和分析经济和政治问题。④与马林科夫谨小慎微的政治行为相反，贝利亚咄咄逼人，此人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他手中掌握着置人于死地的权力——国家警察机关。这个机关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过去只受斯大林控制，现在斯大林逝世了，贝利亚无所顾忌。贝利亚与马林科夫的关系，与其说是合作关系，不如说是互相利用。贝利亚跃跃欲试。

而莫洛托夫从内心里对贝利亚持非常警惕的态度。在 3 月 5 日的联席会议上贝利亚建议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就感到由贝利亚提出这个问题不妥。在 3 月 15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前夕，莫洛托夫给贝利亚打电话，提醒他不要在这次会

议上提名马林科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而应该由赫鲁晓夫提名更为合适。但是，贝利亚拒绝了莫洛托夫的正确建议，执意由他提名。⑤莫洛托夫不反对马林科夫担任政府首脑，但是他认为贝利亚的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莫洛托夫在当时不敢将这个问题提交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避免引起党的领导核心的不团结，也避免与贝利亚发生正面冲突。可见，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莫洛托夫作为党的元老特别注意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问题，他生怕贝利亚此举会刺激赫鲁晓夫，影响到党内团结。但是，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就在德国问题上顶撞莫洛托夫使后者感到十分气愤。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斯大林去世之后，民主德国政治局势出现了不稳定的征兆。莫洛托夫将两个副外长葛罗米柯和库兹涅佐夫叫到自己的家里，起草了一个建议书，大致内容就是民主德国应该做什么。莫洛托夫的看法是，民主德国党的领导正在推行加紧进攻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这是不对的，不应该推行加紧进攻资本家的政策，而应该更加谨慎行事。但是，贝利亚建议把“加紧”一词去掉，于是，外交部的建议就被修改成“在民主德国不推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贝利亚认为：“因为我们只需要一个和平的德国，那里有没有社会主义，对我们无所谓。”这样，莫洛托夫与贝利亚在民主德国问题上就发生了分歧，他们将分歧搬到了中央主席团。莫洛托夫强调民主德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十分重要，而贝利亚则认为民主德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应成为和平国家。于是，中央主席团委员就这个问题形成了不同的意见。赫鲁晓夫支持莫洛托夫，而马林科夫则倾向于贝利亚的意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后，中央主席团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解决这个问题。该委员会由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组成。莫洛托夫感到紧张，因为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观点一致，莫洛托夫陷于孤立。会议结束之后，莫洛托夫看到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散步，这引起了莫洛托夫的怀疑。他认为赫鲁晓夫也不再支持他了，于是他就给赫鲁晓夫打电话：“你

们谈出什么结果了？在德国问题上，你可曾是支持我的。但是我看见了,你们一起散步,想必是琢磨着联合对付我吧？"赫鲁晓夫回答"：不对,我支持你,我认为这是对的。你提出的建议,我一定支持。'随后,贝利亚给莫洛托夫打电话,劝莫洛托夫放弃自己的意见。当遇到莫洛托夫强有力的抵制之后，贝利亚主动退出争论，接受了莫洛托夫的建议。[6]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既然贝利亚盼着斯大林去世之后掌握政权，为什么他不主动或者暗中鼓励别人提他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而主动提名马林科夫担当政府首脑呢？看来，贝利亚也对形势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他自知自己的威望不高，一下子使自己成为政府首脑会出现极度的紧张关系，对他不利。在他看来，让马林科夫过渡一下倒是合理的方案，同时占据内务部首脑位置，可以达到要挟马林科夫的目的。上述情况表明，苏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占据斯大林的政治地位,无论马林科夫、贝利亚,还是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都是如此。

担任内务部长之后，贝利亚采取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和措施，如他在党的中央核心会议上提出赦免一些犯人，划定特别居住区。从贝利亚这项措施的内容来看，有其积极的一面，其他中央主席团成员虽然内心清楚贝利亚此举别有意图，但还是通过了这个建议，这就是 3 月 2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大赦令。随后，贝利亚指示内务部为"医生案件"平反，他还释放了若干个过去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工作的干部。当然，这些举动是贝利亚精心策划的，他专门挑选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案件平反。贝利亚此举旨在收买人心，争取主动，将斯大林时期的清洗责任转移到他人身上。果然，原来的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切夫被解除了苏共中央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在观察贝利亚的一举一动，对贝利亚的所作所为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马林科夫曾经表示，虽然贝利亚的举动有正确的一面，但他有自己的意图和打算。[7]

其实，贝利亚担任苏联内务部部长使党内高层的许多人产生了非常不安全的感觉。贝利亚的所作所为把所有的人都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上去了。当政治核心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境地后，便联合起来行动。一个清除贝利亚的“宫廷政变”处在密谋之中。

第 2 节　清除贝利亚

斯大林虽然逝世了，但达莫克利斯剑还悬在人们头上。斯大林弥留之际，贝利亚所流露出的得意笑容，深深地震撼了赫鲁晓夫和在场的许多人。不久，赫鲁晓夫同贝利亚发生了几次不大不小的摩擦。

赫鲁晓夫顶撞贝利亚

在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提出一项建议，“鉴于许多囚犯和流放犯刑期将满，这些犯人都将返回自己的老家，因此我建议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凡未经内务部的特别许可，不准他们返回老家。我建议要他们迁居内务部指定的地区。”赫鲁晓夫说：“我坚决反对你提出的这种专横规定。我们过去已经有了这一类的东西。现在我们开始在考虑如何更加批判地、正确地估价过去，我们自己不能再把这种冒充法律的非法规定强加于人。你所谈到的这些囚犯和流放犯是由国家安全部门的三驾马车小组专门盘问、审讯和判决的。这些犯人从未经过有见证人、起诉人和法官的正式审讯手续——他们一被拖进来就被关进监牢或则处死。现在你又说，这些由三驾马车判处刑期的人将再一次被剥夺权利，当作罪犯处理，不准他们选择居住地点。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8] 赫鲁晓夫的抵制取得了成效，贝利亚撤回了自己的建议。但是，贝利亚并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停止进攻，他又提出一个建议：把“三驾马车”逮捕起诉的人，其监禁、流放的最高期限由 20 年改为 10 年。赫鲁晓夫再次表示反对。他说：“我之所以反对它，因为我们将对整个拘留和审查制度加以重新评价，不仅仅是改变其一些细节。你是再一次地在试图提倡这种专横的做法。最高期限二十年也好，十年也好，这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总是可以把某人判了十年，以后再来个十年。如有必要，你可以把你所不喜欢的某人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地判下去一直到他死去为止。我们要求彻底修改斯大林时代盛行的那种捕人和审判人的不能容忍的做法。而你却想把专横的规定合法化——你想使现状合法化。现正在把有关的文件收集起来，以便说明你所建议的那套做法在以往是怎样专横、非法地应用的，从而使党遭到了何等严重的损害。”[9] 贝利亚再次退却。

以上是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表述的，不免有吹嘘夸大之辞。从赫鲁晓夫的这些言论来看，明显地具有“追忆”的味道。在当时，赫鲁晓夫用这种十分强硬的口气来质问贝利亚是不太可能的，但赫鲁晓夫带头不同意并抵制贝利亚的某些错误和蛮横做法却是可能的。莫洛托夫也承认，赫鲁晓夫是清除贝利亚的“非常积极的、很好的组织者”[10]。赫鲁晓夫和贝利亚的矛盾不断加深。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无所顾忌，准备同贝利亚斗争到底。

赫鲁晓夫争取马林科夫

赫鲁晓夫开始抓住一切机会争取马林科夫，旨在拆散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联合。这期间，贝利亚提议为马林科夫等人建造豪华别墅，并建在旅游城市苏呼米中心。赫鲁晓夫乘机警告马林科夫，这是一个诡计；这是在民众中制造不满和怨恨”。他还说，贝利亚想“用圈套把你套进这种无法补救的丑闻中去，逼得你辞职。这你明白了没有？”[11]这次谈话引起了马林科夫的思考。

在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指出，各共和国第一书记

应由本地人担任。贝利亚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但赫鲁晓夫感到贝利亚另有所图，这是为了加剧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对立情绪，加剧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把马林科夫拉到一边：“听我说，马林科夫同志，你明白吗，这样会把我们引向何处去？是把我们引向一场灾难。贝利亚在磨刀了”。赫鲁晓夫进一步说：“是抵制他的时候了。确实，你必须看出贝利亚所持的立场的反党性。我们绝不可容忍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加以反对。”

马林科夫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一个人来反对他吗？这我不干。”

“你怎么能认为只有你一个人单独反对他呢？这里就有你和我——这样已经有两个人了。我看布尔加宁肯定会同意我们的。我和他已经不止一次交换过意见了。我相信，只要我们从坚定的党的立场出发提出我们的论点，其他人肯定也会参加到 我们这一边来。问题在于你在主席团会议上从不让别人有发言的机会。只要贝利亚一提出什么动议，你总是迫不及待地马上支持他，说‘这个很好，贝利亚同志，真是个好建议。我赞成，有谁反对吗？’然后就径自付诸表决。你不妨试一试，给我们其余人有一个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你就将看到会出现什么情况。你自己要沉得住气。不要这么性急。你将会看到，并不是你一个人有你这样的想法。我深信有很多人会跟我们站在一起来反对贝利亚。你和我一起来搞一个会议议程，把我们认为贝利亚是错误的一些问题也排在议程之内。然后我们就反对他。我深信，我们能争取到其他主席团成员的支持，通过我们的决议。让我们就这样来试试看。”⑫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联合行动

马林科夫开始同赫鲁晓夫联合，这是清除贝利亚的关键一环。他们在主席团的一些会议中，连续几次击败贝利亚，这大大增强

了他们清除贝利亚的信心。然而，贝利亚也看到了苗头。双方都加紧活动。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迅速开始逐个争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首先由赫鲁晓夫找伏罗希洛夫密谈，但两人见面后，伏罗希洛夫一开口就为贝利亚大唱赞歌，把赫鲁晓夫的嘴给封住了。然后，赫鲁晓夫转而密见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表示完全支持，但他马上问马林科夫对此事持何种态度。赫鲁晓夫回答：“我是代表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来同你商量的。我们已经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了。”莫洛托夫又问此事究竟怎样进行，最后又将如何。赫鲁晓夫答：“首先，我们必须解除贝利亚担任的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以及内务部长的职务。”莫洛托夫认为，这还不够，“贝利亚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想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好比说——更极端的措施”。[13]

赫鲁晓夫又同萨布罗夫谈。他很快表示支持，接着他问：“可是马林科夫怎么样？”凡是赫鲁晓夫找谈话的人都提出这个问题，足见马林科夫政治地位的重要。

当时卡冈诺维奇没有在莫斯科。他出差去视察木材工业状况回来之后，赫鲁晓夫马上去同他密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谈起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卡冈诺维奇立刻警觉起来：“‘我们’是谁？”赫鲁晓夫向他通报了反贝利亚联盟的成员和打算，并对他说，即使他不参加，“我们”也在主席团中占多数了。卡冈诺维奇马上宣布：“我也跟你们在一起。我当然跟你们在一起，我只是问问的。”[14]

接着，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先后找别尔乌辛谈话。他开始犹豫，后来表示“完全同意”。与此同时，马林科夫也把伏罗希洛夫争取过来了。

这样，除了米高扬之外，所有主席团成员都加入了反贝利亚秘密联盟。

贝利亚是怎样被捕和被处死的

贝利亚之死，众说纷纭，成为苏联历史上的一大谜案。西方记者魏特林写了一本贝利亚传记，称贝利亚“是被杀死三次的人”。他提出了三种可能：一是，1953 年 6 月 27 日晚，莫斯科国家大剧院首演著名歌剧《十二月党人》。苏联党政要人都要前去观看。贝利亚在途中被坦克拦住去路，他没被送到大剧院，而是被送到了郊外的一所监狱。当晚，贝利亚被枪决。二是，1953 年 6 月 28 日下午，苏共中央主席团举行重要会议，专门处理贝利亚的问题。在审判中，贝利亚从公文包中取出手枪，旁边的赫鲁晓夫立即将贝利亚的手按在桌子上；马林科夫惊慌中按了桌子上的电铃，发出了预定好的紧急信号；莫斯卡连科将军手持冲锋枪冲进来，打死了贝利亚。三是，1953 年 6 月的一个傍晚，贝利亚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在波兰驻苏大使馆参加宴会。宴会后，贝利亚被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带到一所监狱大厅。贝利亚受到了审判，并立即被枪决。

但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莫洛托夫回忆录和最近披露的材料来看，大致过程如下：6 月底，反贝利亚联盟取得了军队的支持。朱可夫、莫斯卡连科等十多位元帅和将军参与了此事。按照规定不准军人携带武器进入克里姆林宫，于是，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用自己装有暗玻璃的小轿车，经过波罗维茨基大门，把武器带入了克里姆林宫。在马林科夫的会客室里，为不引起怀疑，将军们都说是同部长一道来出席会议的。布尔加宁和朱可夫来到会议室，交代了任务。他们说，一听到暗号，就进入会议厅。

会议厅将要召开一次党政高层会议。这是一次很特别的会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都被邀请到会。同时还特邀伏罗希洛夫出席会议，因为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通常不参加部长会议。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他特地提醒大家，这是一次中央委

员会主席团会议，而不是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他接着说：“我们来讨论党内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马上讨论。”按照事先布置，赫鲁晓夫要求发言，提议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坐在赫鲁晓夫右边的贝利亚很吃惊，他抓住赫鲁晓夫的手，神色惊慌，“干什么，尼基塔？你在咕噜咕噜什么？”赫鲁晓夫历数了贝利亚的罪行，认定他“决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是一个“野心家”“叛徒”。莫洛托夫在发言中表示：“我认为贝利亚是蜕化变质分子，这个人不能重用，他不是共产党员，也许他曾经是共产党员，可现在他蜕化变质了,这个人是党内异己分子。”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的观点。他表示：“莫洛托夫说贝利亚是蜕化变质分子。这不对。蜕化变质分子指的是一个人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不够共产党员了。但贝利亚从来就不曾是共产党员！他算什么蜕化变质分子？”[15]紧接着布尔加宁等人一起向贝利亚发起进攻。贝利亚为自己辩护：“当然，我有错误，可是我请求你们不要开除我的党籍，我可是一贯履行党的决议和斯大林指示的呀。斯大林把一些最秘密的重大案件交我办理，我都按要求照办了，所以开除我的党籍是不对的……”[16]米高扬最后一个发言，他反对批判贝利亚。

大家发言完毕，会议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冷场，气氛非常紧张。赫鲁晓夫打破僵局，他提议解除贝利亚一切党政职务。马林科夫有些紧张，他没有把这个决议付诸表决，就去按秘密电钮。铃声响了，将军们两人一组，拿着手枪从三个门分别冲进来。马林科夫提议表决：“谁同意逮捕贝利亚？”全体都把手举了起来。马林科夫又对朱可夫说：“我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名义要你把贝利亚看管起来，以便对他所被控告的罪行进行审查。”朱可夫走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贝利亚面前,喝道：“把手举起来,你被逮捕了。”贝利亚转身伸手要抓放在窗台上的公文包，赫鲁晓夫扑过去，揪住他的手臂。后来发现贝利亚身上和公文包里都没有武器。[17]他抓公文包大概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贝利亚被捕后，自己将头往墙上撞，自言自语：“我怎么会栽了呢！”[18]

1953 年 7 月 10 日，苏共中央7 月全会发表公报。公报说：“最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会议。苏共中央全会在听取和讨论了格·乌·马林科夫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拉·巴·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破坏苏维埃国家、阴谋把苏联内务部置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之后，决定解除贝利亚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苏联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并宣布把贝利亚罪行案件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1953年 12月18至 23 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秘密审理了贝利亚等人的案件。法庭由几位著名的军官和法官组成。审判长是科涅夫元帅，审判员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格鲁吉亚共和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库查夫、莫斯科市法院院长格罗莫夫、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鲁涅夫。

很快就有了判决结果。12 月 24 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发布通告，宣布 12月23 日根据判决，已将贝利亚、麦尔库洛夫等 7 人枪决。

清除贝利亚，标志着一个恐怖时代的终结。新的赫鲁晓夫时代就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开始了。苏联社会初现解冻迹象。

第 3 节“整顿”、“清理”的历史效应

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斯大林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破坏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

赫鲁晓夫刚刚上任，就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对政治领域进行一番“整顿”、“清理”。赫鲁晓夫说：“在我们苏维埃国家的生活中，斯大林逝世后的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整顿和清理的时期。”[1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